

## 人类近代以来几次重大革命浅析

——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反思』的批判

□李工

1990年代的学界一度出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反思”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李泽厚语),断送了原本可以和平实现的君主立宪,造成了军阀执政和军阀混战,导致了近百年不断折腾的激进主义,是不断革命的思想源头……在这场颇有影响的“反思”中,辛亥革命黯然失色为一场不应该出现的历史挫折。在“中国再也经不起暴风骤雨的革命”(林同济语)共识中,“告别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呼应。似乎革命是一种选择,说告别就可以告别了。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不是一种“选择”,下面列举的人类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革命也不是一种“选择”,它们都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是符合革命逻辑的必然现象,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革命家、革命党从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革命”,是后人出于意识形态教化需要编造的政治神话。例如北美独立战争,被主流说法模糊了的引发战争的真正原因,恰恰说明革命是无法“告别”的。北美大陆人坚守的精神原则——唯西方文化才有的对中国入最具启蒙意义的“无代表不纳税”,也湮没在“告别革命”中了。

## 为三便士打一场战争

人类近代史上几起重大革命,唯北美独立战争受到一致的好评,史学家赞不绝口,政治家推崇备至;思想家认为那是一次辉煌的日出;文学艺术家用最美的语言讴歌不尽;教科书则庄严地概括:北美独立战争是美国人民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了民族独立、为了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叙述中,人们误以为北美独立战争是在教科书上讲的那些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目标中发动的“既有思想准备,又有组织准备”的革命。

事实上,1775年列克星敦“震惊世界的第一声枪响”之前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美大陆人并没有想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所谓“民族独立”,从英国移民过来的北美大陆人在战争爆发时根本就

【作者简介】李工,人文学者,自由撰稿人。

没有这样的念头。战争打响四个月,北美大陆会议还通过决议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申明只要取消在北美大陆的征税,北美大陆人仍然是大英帝国忠实的臣民。当年北美大陆人的政治心理与教科书上说的恰恰相反,他们不但不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还以自己是英国(殖民地)人为骄傲呢。这一点从“北美大陆人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七年战争时,闻知英国战胜了法国、夺取了加拿大后给友人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没有什么比加拿大的陷落更让我们高兴的了,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殖民地人,更因为我们是英国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只管制与己有关的商业贸易,不参与地方行政管理。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大陆实行高度的自治,有着《大宪章》精神血统的北美大陆人选举的地方政权,是真正的民主体制,“有事大家商量”是那时北美大陆的社会常态,除了边境、海岸时有法国等外人侵扰外,北美大陆人在这种政治环境中过着民主、自由、安定、和谐的生活,经济发展很快。所以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开会讨论财政困难解决办法的时候,才有“北美大陆富得像一只肥鹅,拔几根羽毛算什么”这样的说法。那时北美大陆人遇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忠于国王,忠于大英帝国”。这不是奴役下的效忠,而是他们的生活体验。七年战争时英国在北美大陆上打击法国,主要是为了保护殖民地人民不受侵扰,当然这种“保护”与英国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教科书上说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在当年的北美大陆是不存在的,所以用“为了反抗英

国殖民统治”解释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一种并不能说明具体问题的笼统空洞的说法。

造成英国政府与北美大陆战争对抗的唯一原因,是英国政府要在北美大陆课税;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微不足道的三便士茶税。“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向北美大陆征税?”“北美大陆人为什么不缴纳微不足道的三便士茶税?”此事说来话长,简述如下:

七年战争时,英国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债务,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由于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卫北美大陆人,英国政府打算将一部分债务分摊给他们,于是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764年)英国政府向下院递交了向北美大陆课税的《美洲岁入法案》并获得通过。此事在北美大陆人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英国议会里没有自己的代表,政府向他们征税是违反“无代表不纳税”宪政原则的。1765年英国政府不顾北美大陆人的反对,在“战争已将法国人从北美大陆赶走,对北美大陆人的安全和生活威胁消失了,北美大陆人帮着付这笔战争费完全是公平的”(〔美〕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第三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理由中,又通过了向北美大陆人征收印花税法。于是,抵制英国政府课税的活动开始席卷整个北美大陆,不仅一些收税人的办公场所被捣毁,连他们的家也遭到袭击。这个期间英国首相格伦维尔让秘书撰文向殖民地人宣传:“殖民地人在议会里是被代表的,如同多数英国人不可能在议会中投票,英

国人和殖民地人一样都是由帝国议会里的议员所代表。”（〔美〕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第三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然而北美大陆人不相信格伦维尔的胡言，他们相信的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权利原则：代表必须是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指定代表都是骗人的把戏。于是在印花税通过的当年，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在纽约开会通过决议，首先声明忠于国王和王室，但反对政府向北美大陆课税的政策，“除非北美大陆人自己同意，或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同意，不得对他们征税”（〔美〕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第三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印花税在北美大陆人的一片反对中无法推行，英国议会便在1766年春废除了印花税法，殖民地人民一片欢腾。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英国新内阁又通过了在北美大陆征收进口税法，史称《汤森法案》。《汤森法案》实施后不但没有收上税来，反而导致了袭击英国官兵驻地的情况不断发生。于是，1770年又一届新内阁提议撤销《汤森法案》中的其他税，仅保留三便士茶税作为英国主权的象征。然而这种做法正如缪哲先生所分析的：“乍看是务实的，其实却是愚蠢的，这样的象征，以前或许可以保留，但经过了几年的对抗后，美洲人对英国已产生了深深的猜疑，自尊变得很敏感，顽固地保留茶税，会使问题的重心由利益而转向原则。”（缪哲：《美洲三书·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西方人眼中，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原则是不可以让步的，例

如权利是不能丢的。三便士茶税虽然微不足道，却违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原则，是对北美大陆人权利的侵犯，是暴政的表现，是不能容忍的。三便士茶税对英国政府毫无实际意义，却时时刻刻地提醒北美大陆人的抗税精神——对财产权的维护，并不断累积对英国政府侵犯他们权利的愤怒。1773年底波士顿人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三船茶叶抛入大海，便是这种愤怒的总爆发。作为对此事的报复和惩罚，英国议会1774年6月通过了《强制法案》，使事态进一步恶化。1775年4月，列克星敦的老百姓与英国巡逻军发生冲突，枪声响起，事件很快地波及其他地区，战争就这样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了。由三便士茶税引发的武力对抗不久就演变为一场为主权而战的独立战争。

三便士茶税引发战争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并且至今也没有完全融入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人要像人一样活着，一些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譬如财产权。税权是财产权的一种让渡，不管是纳税还是征税，权力都归属纳税人，是纳税人花钱买服务。然而在财产权这个问题上最容易出现暴政。暴政往往引发战争。只是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暴政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宪政理念，中国人眼中的暴政说来十分简单：仅指造成老百姓无法活下去了的统治。例如秦“苛政猛如虎也”“无法活下去了”的农民只好造反起义。而西方人，例如北美大陆人眼中的暴政，不一定“无法活下去了”——只要违宪，只要政府利用强权

侵犯人的权利,即为不可容忍的暴政。所以,他们为三便士茶税打一场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革命不是谁发动起来的,而是与“三便士”密切相关的纳税人自发地“人人自为战”;这样的革命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和理想,仅仅是为了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这样的革命不是说告别就可以告别的,它是“革命的逻辑”——暴政导致反抗的必然现象。如果说北美独立战争是暴政引发革命的一个著名案例,那么下面所讲的法国大革命,则是改革导致革命突然爆发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件了。

## 法国大革命是国王自己“发动”的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影响与里程碑意义众所周知,它不仅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更以其《天赋人权》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然而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大革命,却是路易十六推行的改革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在1789年前,从国王到第三等级人民都未曾料到。

路易十六在1774年即位后,便放弃了“朕即天下”的路易十四和“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些民怨鼎沸的恶政,力图改变前朝造成的国库空虚、国力衰败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法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然而短时期的经济发展,无法彻底扭转法国前朝一百

多年恶政造成的财政困难,于是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在“共商国是”中增加税收,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然而此时的第三等级人民已今非昔比,路易十六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天性浪漫的法兰西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想象物质生活以外的东西,温饱的生活土壤,则成为启蒙思想最理想的生根发芽的地方。法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是纳税人养活了国王和政府,国家应是为了纳税人而存在的。自己不仅有纳税的义务,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有权决定税收和税款怎样使用的权利。这样的生存常识提升出的政治理念,决定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纳税人选出的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组成,否则的话“无代表不纳税”——这是路易十六时期法兰西人民从启蒙运动中得到的最大的启蒙,也是从一衣带水的邻国,那个具有《大宪章》精神传统的不列颠人那里学来的最有价值的借鉴,也是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权大无边、无度挥霍税款的历史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路易十六没想到把全国各地的第三等级代表召集到一起“共商国是”,实际上是办了一件革命家、政治家梦寐以求的事:聚集到一起的第三等级的代表,终于有机会向国王提出“主权在民”的要求。所以会议召开之前就决定了“共商国是”的僵局:国王想改善税务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代表们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以君主立宪改变国家的政体。国王的想法与入会代表的要求南辕北辙。不过此时的第三等级代表还没有推翻国王的意思,希望搞君主立宪的拉法耶特的思想还是大



多数代表的意愿。如果此时的路易十六能审时度势,接受代表们的改革要求,推行君主立宪,大革命很可能不会爆发,那样人类史上又多了一个“光荣革命”,路易十六也会免于后来的厄运,法国历史也将改写了。然而政治麻木的路易十六看不到整个法国社会正在酝酿的时局变化,面对僵局,他竟意气用事地接受了贵族们的愚蠢建议:关闭会议大厅,终止了“共商国是”。这无疑给群性激愤的代表们火上浇油,随之而来的第三等级代表的“网球场宣誓”,实际上已经点燃了大革命的烈火。革命烈火中的群众是没有理性的,人们涌上街头,捣毁税卡,攻占巴士底狱,巴黎顿时陷于一片骚乱中,后来虽然以拉法耶特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企图通过制宪议会,力挽狂澜阻止暴力革命的愈演愈烈,但群众革命运动像决堤的洪水,是无法控制、无法抗拒的。大革命不仅以一票之差的群众表决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还迎来了腥风血雨的雅各宾政权的恐怖时期。

很显然,路易十六的改革带来的繁荣和宽松孕养了大革命,三级会议则催生了大革命,所以说,大革命是路易十六自己一手造成的。正像财政学者李炜光教授所总结的:“经济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于绝对剥削,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来于相对剥削。”(《李炜光说财税》,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当然,路易十六认识不到,解决“相对剥削”才能解除危机,唯一的办法是政治改革。1789年7月骤现的革命事态,不仅

出乎路易十六的料想,也出乎第三等级代表们的想象。路易十六不明白,他关心的财政问题,其实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大革命以《天赋人权》立下了历史的丰碑,却也以血的教训告诫后人,革命不是一种“选择”,革命是无法阻挡的“溃决”(顾准语);要想避免流血的革命,只有将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这是“告别革命”的唯一办法。不过,这不是书生坐在书斋里说说“告别革命”就可以实现的。“告别革命”只有统治者才能办到——它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明智,是否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是否有勇气将改革改向统治集团自身(放弃部分权力和既得利益)……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革命总是在统治者对历史的健忘中不断地以新的形式上演。例如,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

### 沙皇统治垮台在“面包、面包”声中

以往的教科书上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沙皇统治是被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苏联解体后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大量的史料证实,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垮台的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在无预谋、无组织、无领导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彼得格勒市民因买不到面包走上街头喊着“面包、面包”,越聚越多的群众很快地变成一场骚乱并殃及全国,沙皇面对派去镇压的军队的哗变,不得不接受杜马劝其退位的建议。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等革命党人大部分在海外。当年教科书的说法是沿用了苏联官

方对历史做了不光彩的手脚的教材。关于二月革命前后这段史实,苏文、金雁等学者多有介绍和论述,这里不赘。只想指出,改写了俄国历史的二月革命出乎所有革命家政治家预料,是一次无人发动的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二月革命有力地佐证了“革命不是一种选择”,二月革命前俄国的革命家、革命党人想发动革命,就是发动不起来,他们盼望革命,革命就是不出现,二月革命是在革命家几乎对革命绝望了的时候突然爆发的。

为什么一场“面包、面包”的骚乱会酿成人心大变、政局骤变的全国性革命运动?二月革命的大爆发,与1905年俄国革命后内阁首相斯托雷平改革有着必然的联系。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改革的不公正操作导致腐败与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在改革中暴富起来了,绝大部分人却沦为新的无产者。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怨恨日积月累,终于在1917年2月的彼得格勒借助“面包、面包”的呼声爆发出来,酿成一场改写了历史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能说“告别”就告别得了的吗?

当然1990年代“反思”中的“告别革命”,与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执政中逐渐形成的斯大林极权统治造成的社会黑暗、人民苦难有关。然而这个历史事实不是二月革命造成的,是俄国人丢弃了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创造的精神财富,忘记了思想家赫尔岑曾经提醒的“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于现实,而是执迷于抽

象观念”,在“集体无意识”的盲从中踏入了“抽象观念所设下的坑人的陷阱”(赫尔岑语)。这是抛弃自己民族知识精英的俄国工农大众不得不接受的宿命,是专制主义体制形成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当俄国工农大众在“抽象观念”的鼓动下,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对象的时候,俄国人的苦难就已经降临了——社会没有了知识分子这个“批判的武器”(马克思语),便成了政治家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试验田。这是俄罗斯民族留给人类的一个惨重的教训。二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同样发人深省的方面:突然爆发的革命是没有理性的,动乱的社会很容易成为革命家、政治家表演的舞台。由于知识分子不在场或知识分子不能以独立的身份、批判的眼光发言,这个舞台只能在政治家的自编自演中落下失败的帷幕。

“告别革命”论者将革命后的暴力统治及这种统治造成的黑暗与苦难,一股脑儿地归罪于先前的革命,掩盖了革命后暴力统治者应负的罪责;绕开了遭受这种统治的人民大众应该自省的民族文化;回避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后,或集体沉默——对身边发生的荒谬和惨烈视而不见,或集体缴械——成为新的奴才和帮凶。“告别革命”论者无视历史的经验,无视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杜撰革命是人们“选择”的神话,然后好为人师地告诫不要“选择”革命,要“选择”渐进式改革。然而在专制主义国家里,这种“选择”只有统治者才能做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选择”权的。所谓“渐进式改革”,都是也只

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专制帝国里这样的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至于革命,没有那个统治者会愚蠢地“选择”自毁长城。所以“告别革命”论者等于说了一堆废话。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1990年代“反思”中的批判激进主义与“告别革命”汇成的这股思潮,冲淡了原本应该反思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进而深究“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什么总是引发革命”这个重要问题。正因为回避了这个重要问题,所以“反思”的几位学者无视清末新政导致辛亥革命这个历史事实,不顾革命的逻辑指责辛亥革命,并一唱三叹地惋惜实质上不可能成功的清末君主立宪。

## 英国君主立宪的启示

清末君主立宪,是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中食洋不化的一个典型案例。1990年代的“反思”认为,若无辛亥革命,君主立宪肯定会成功。这样的“认为”,与清末当年力倡君主立宪的人们一样,是只看到君主立宪在英国数百年成功的现象而产生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搞清英国君主立宪的来龙去脉,探究一下不列颠人宪政理念的历史渊源就会知道,君主立宪在当年的中国很难成功。

君主立宪在其故乡英国历史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英国人对未来道路的一种选择,1688年光荣革命中诞生的君主立宪,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是

王权与民权(议会)长期斗争达成的妥协。众所周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688年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是因为英国在这一年没有经过流血暴力便实现了政权更替和国家体制的改变。实际上,光荣革命不是个孤立的政治事件,它是长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没有始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便不会有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并不光荣,因为诞生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为时半个世纪的刀枪相见的内战。其间,查理一世的被砍头,“护国主”克伦威尔死后的被掘尸悬颅示众,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内战现象。所以说,光荣革命的历史其实是不光荣的血与火的战争史。教科书将这场内战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光荣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起来,开辟了人类近代文明新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教科书上所讲的那些大道理,革命爆发的原因仅仅是纳税人反对国王未经他们同意擅自征税;是为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实现税权还权于民。君主立宪标志着这场革命的全面胜利,从国家政体和法律上为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自由和活力,成为17世纪后英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活水源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反映出,英国人把税权看得比命还重要,例如前述北美独立战争也可看出税权意识在英国人中的神圣地位。税权意识是英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久意义的精华,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他们治国安邦的思想源头。

英国自古以来就不尊奉“王权神授”,

却一直信守“王在法下”，法律是全社会公认的神圣原则，是包括国王在内人人必须尊崇的“至高无上”。远在中古时期，“英国国王登基加冕首先要宣誓‘维护法律’，国王虽然高于民众却低于法律。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英国国王与纳税人之间约定俗成这样不成文的规定：未经纳税人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税”（阎照祥：《英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对国王的用钱、用人来于民间这个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是一种权利让渡。所以赋税不是白纳的，国王必须保护纳税人，为纳税人提供一定的服务。英国历史上的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所以不容易被国王的权力破坏，能够千百年存在，与英国人牢不可破的财产权意识直接相关。他们坚信财产权是唯一可靠的，没有财产权，什么权利都不复存在。著名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讲的是自己的房子虽简陋，未经自己同意，国王也不可以随便进，反映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财产权很容易被强权剥夺，所以限制国王的权力是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第一要义，其要害就是设法不让国王擅自征税。

在13世纪英王约翰时期，英国人的税收思想已经很成熟了。约翰因为发动对外战争需要钱而增加税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叛乱，民众以武力与国王对峙，抗议约翰擅自征税。被誉为宪政主义源头的《大宪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大宪章》的核心内容是规定国王不可擅自征税，任何赋税都必须征得所有纳税人的同意。《大宪章》曾经

长期维持了英国社会秩序，虽然尔后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倒行逆施，擅自征税，但有着根深蒂固税收意识的英国人，自《大宪章》形成的宪政理念和民主思想是不可动摇的，在税收问题上毫不含糊，绝不让步，战争终于不可避免——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君主立宪，实质上是《大宪章》精神原则的发扬光大。由此可以看出，宪政民主成为社会常态并非易事，有着税收文化传统的英国，从《大宪章》到君主立宪经历了大约四百七十多年的时间。由此想到，从来没有税收意识和宪政理念的中國人在清末那个多事之秋，想一夜之间变成君主立宪，只能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西方有谚：“民主是争来的。”君主立宪也是争来的。事实上，清末统治集团在危机四伏中搞的新政，是不得已而为之，与所有统治者一样，他们不会自动放权力。何况在百年前，受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中国现实土壤，也不太容易存活以宪政民主为本质内容的君主立宪。在一定意义上说，君主立宪是英国才有的那种“王在法下”“法比权大”的传统文化的产物，这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中所不具备的。

英国古代就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国有经济”。由于英国历史上没有“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国有经济”，所以也就从未出现过像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即便那个英王有秦始皇的野心，也很难得逞，这是英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生存价值观所决定的。如果哪个英王想搞“国有经济”，人民会



以战争反抗。古时的英国议会不是产生于政权需要或政治家的设计,而是纳税人联合起来与国王斗争的产物。议会坚不可摧的存在,是英国人实现财产权的重要保障。英国历史上的国内战争,多是因税权问题引起的维权斗争。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财产权理念,不会为了权利打仗,许多战争最终往往是拥戴了一个新皇帝,皇帝与权力才是中国人眼中的神圣。中国纳税人虽然养活了皇帝,却一有机会就喊“皇恩浩荡”,并奴性十足地信守“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即便自己的财产被强权剥夺了,还愚昧地相信财产充公后会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呢!英国人的财产权理念和税权意识决定了英国文化中没有“大救星”的说法。从不相信国王会给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国王能不违法擅自征税,就是好国王了。

英国从中古时就形成了对任何人的治罪,都必须经过法律程序的审判后才能执行的 tradition,不像中国历史上的有权者一句话就可以定罪,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英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多是法律意义上的事件。164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质上就是反对国王违法。这场长达五十年的革命最终以君主立宪作结,严格说是法律的胜利,是宪政的成功。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不管是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还是代不乏出的战争,都是在“无法无天”中的权力争夺,人们崇尚“拳头大的是哥哥”“有枪就是草头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从不考虑政权的法律来源和执政者的合法性。有着这样“无法”文化传统的国人怎么可能“接轨”宪政法律构成的

君主立宪呢?

综上,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要点:一是君主立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到渠成。二是君主立宪是英国以税权意识与宪政理念为核心思想的传统文化结出的硕果。三是直接催生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是王权与民权(议会)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出现的妥协。清末君主立宪不具备这些条件,清廷“犹抱琵琶半遮面”出台的君主立宪方案,是清廷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中的临时抱佛脚,既缺乏诚意也没有政治决心,说到底统治者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交出权力呢?清末社会没有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足以与清廷谈判的组织力量。革命党虽有多次起义,都被清廷镇压在血泊里,不成气候。民间呼吁君主立宪的力量,仅仅是舆论鼓吹,缺少政治组织与军事势力的依托,不可能与清廷“讨价还价”。清末新政是见多了的自上而下进行的“专制帝国改革”,成败取决于统治者自身,社会力量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换言之,“专制帝国的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清末朝廷岂能例外?退一万步讲,即便没有1911年的武昌起义引起的政局骤变,清末新政继续下去,按照“上谕”在1913年召开国会,君主立宪进入全面实施,情况也不会好处到哪里去,君主立宪很可能成了“南橘北枳”的注脚,成了中国人见多了的“挂羊头卖狗肉”。一百年前的国人缺少对宪政民主的了解,不具备接受宪政民主的文化素养和心理素质,还未形成君主立宪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条件。在后来的“走向共和”中,袁世凯将整个民国

玩弄于股掌之中,“猪仔议员”,选民视选票若儿戏,这类数不胜数的落后与愚昧,充分说明这个未经启蒙的民族对宪政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也没有这方面的基本价值观。其实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国推行政权农村基层组织村委会的选举时,许多农民在“馈赠”的一桶花生油、一箱啤酒中,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手神圣的一票给了那些“馈赠”的“乡村政治家”(吴敬琏语)。而且,这种情况在时下农村选举中已屡见不鲜。面对此情此景,能责难一百年前的国民吗?还惋惜什么清末君主立宪吗?

惋惜清末君主立宪,犹如悲叹“朽木不可雕也”,都是毫无意义的。此时的清廷政权已经腐朽透顶,整个国家机器已被腐败锈蚀得不能正常运转,不仅没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连管好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都没有了。统治集团除了倒行逆施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这是所有行将灭亡的政权的共同现象。几个王公大臣在国外的存款之巨,都“富可敌国”,所以才有了袁世凯奏议清廷个人出钱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样的怪事。一个政权腐败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它的存在已是一种罪恶,让它垮台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道义上也是应该的。一百年后的今日中国,几位学者“事后诸葛”地指责辛亥革命,惋惜君主立宪,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对革命逻辑的无知,还是对“天道”的无理了!近百年来的不管有多少人对辛亥革命怎样说三道四,辛亥革命把一个反动、落后、腐朽的政权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伟大功绩是抹煞不了的。

的。辛亥革命高扬的宪政、民主、共和的精神原则是永存的!

## 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路标

教科书上讲,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称旧民主主义革命。大量的史料证实,1911年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海外,其他革命家也都不在场,武昌起义是一次与革命党没有直接联系的突发事件。这次起义及其带来的1911年中国政局骤变与清末新政直接相关,是改革导致革命的中国版案例。对此笔者已在《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载《书屋》2011年第2期)中已有论述,这里不赘。教科书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旧民主主义”说法不妥,就像杜导正先生在《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中所指出的,“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如上所述,民主的核心思想是“主权在民”,实现这个思想的唯一途径是:纳税人自己选出信得过的代表参政议政,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先假定一个真理的化身操纵代表的选举。如果承认人民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资产阶级人民或无产阶级人民、新人民或旧人民,那么作为“主权在民”的民主哪来的阶级属性或新旧的差异呢?辛亥革命高扬的“宪政、民主、共和”乃是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是西方人历经数百年发现的好用的东西,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竟昙花一现,便消失在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对全体民众实

行统治的政治体制中”(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政治体制”看上去不同于君主专制,实质上是用权大无边的领袖代替了君主;用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这种一党专制较之清末的君主专制要虚伪得多,君主专制统治是里外一个模样的明火执仗;一党专制统治却成了欺骗天下人的“挂羊头卖狗肉”——“内定”的议员、代表和议会,是领袖左右的执政党实行专制统治的招牌。这种专制对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控制,比清末时期要严厉得多,并采取各种措施钳制人民的思想,完全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以言论、信仰获罪,是一党专制的统治常态。“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这种草菅人命比君主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专制主义统治者总是拿“国情不一样”说事,拒绝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并用冠冕堂皇的“抽象观念”另辟蹊径,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所谓军政、训政、宪政实际上是自寻弯路,最终执政党走上了绝路,也贻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后,宪政民主仍然是今日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是很发人深省的。由此不难看到,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中国一百多年来艰难的社会转型的路标,这个路标所指向的宪政、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90年代的“反思”者们,为什么要避开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指责辛亥革命搞糟了呢?“反思”所列举的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独裁统治以及“革命、

再革命……”其实与辛亥革命不存在内在联系,更不是辛亥革命的逻辑结果。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之所以走上了弯路,造成了无法估量、更无法弥补的损失,只能说,是因为背离了辛亥革命确立的宪政民主的精神原则,抛弃了辛亥革命这个指向人类现代文明的路标所致。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最应该反思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什么会背离了它的原则、让专制主义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告别革命”汇成的思潮中并未触及。“反思”看上去是在检讨中国近百年现代化历程,却用“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想主流”,模糊了新专制主义贻误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历史事实。这场思潮虽不乏争鸣,却都是在抽象的“主义”上打口头官司,是见多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惯于脱离实际问题玩“文字游戏”,并未展示辛亥革命后明摆在那里的新专制主义统治,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反思”还回避了百年中国历史启示今人应该高度警惕的问题:历史并非是一条不断进步发展的直线,它有时可能逆转,可能倒退,可能出现旧势力、旧思想、旧体制在“挂羊头卖狗肉”中复辟。这场思潮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告别革命”等这类不着实际不切肯綮的概念上大做文章,助长了不乏复古色彩的“文化重建”的声势,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以人类先进文明为参照系的启蒙,在“文化重建”中让位于传统文化的高扬。问题的要害是,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时下中国,最需要的是民族启蒙——像宪政、民主、

科学、自由、平等、人权,以及税权意识、契约意识、公民意识等构成“文化重建”的要素,都是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想到1990年代以来,宫廷戏的接连不断;帝王将相的粉墨登场;史学界的“盛世新说”;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的登堂入室;先秦古籍的大量出版;国学热的方兴未艾;读经活动的此起彼伏,大学校长要给经学“上户口”(进教材)——这种与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与现实社会正在运行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均南辕北辙的“文化重建”,实质上是一种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的精神复辟。不可否认,这种甚嚣尘上的文化折腾,是1990年代的反思思潮冲淡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开放意识的结果,是在这股思潮导致的回归传统、弘扬传统文化中愈演愈烈的。于是觉得,应该反思的是1990年代的“反思”者。他们应该为后来的文化折腾“买单”。实际上,“反思”与后来的文化折腾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匮乏,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也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学界无甚思想建树的根本原因。如果说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思想改造中被迫集体缴械,那么1990年代的反思者们,则是在迷惘中失去了1980年代的思想锋芒和精神锐气,在老气横秋的战战兢兢中退却为思想矮化、精神奴化。不管是批评激进主义,还是呼吁“告别革命”,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一阵诚惶诚恐后的条陈奏折。这些声音,其实最广大人民群众听了毫无用处,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的国策也没有什么裨益。如果承认宪政民主是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那么启蒙让位于古文化的张扬,则不啻为新愚昧。而宪政民主的运转是需要若干条件的,国民共识则是其中之一。如上所述,中国人对宪政民主,对市场经济还不太熟悉,甚至还很隔膜,对其复杂的来龙去脉,对其丰富的含义,知之甚少。所以,以上述启蒙内容为要素的文化重建,特别是将税权意识融入国民的基本价值观——这个被人们忽视了的最重要的启蒙,是今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远任重。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启蒙的夭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启蒙的缺位,致使基本价值观的“更化”(余英时语)远远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神圣天职。半个多世纪来启蒙的无所作为,贻误了这个民族的觉醒与进步。所以,作为纳税人养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反思自己是怎样丢弃了社会担当与历史使命的,是怎样昧着良心不再为纳税人服务的!

1990年代的这股反思思潮,由于是学界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发轫,反思的影响尤为广泛而深远。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子里,指出“反思”如何糟蹋了辛亥革命这座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丰碑(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如何涂抹了辛亥革命映照千秋的光辉(确立了宪政、民主、共和的国家政体);如何避开了启蒙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必不可少的一步;如何误导了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的认识,便显得十分重要。笔者批判“告别革命”,并非崇拜革命,作为过来人,对过



去借革命的名义造成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革命曾经在人们的愚昧和狂热中异化为一种折腾,一种历史的罪恶。“反思”者为什么不分真革命与假革命、正义的革命与邪恶的革命、促进历史进步的革命与破坏社会发展的革命,一锅端地“告别革命”?——如上所述,可能吗?告别革命论者所诟病的革命后出现的“恐怖和谎言”(哈维尔语),以及深重的苦难,非革命之罪,乃革命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的结果。所以不应该枉谈“告别革命”,应该反思怎样避免革命的逆转。换言之,革命后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这个问题,北美独立战争后的知识精英向人类提供了一份堪称典范的答卷,这场革命后的伟大成功,不仅仅由于华盛顿的不擅权、不恋栈;更重要的是,负有使命感的知识精英以独立自主的参与精神,催生了一部实现美国长治久安的联邦宪法。最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借以反观的是,革命后北美大陆决定人民命运的事件,知识分子都在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抛开政治家发动的那些应该诅咒的革命运动便会看到,真正的革命是一种无奈,就像本文所列举的,是一种应该同情、应该理解、应该肯定的无奈,是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捍卫最后的权利防线和生存底线。当政权变成鱼肉人民的暴政、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变成倒行逆施的反动、变成除了腐败不会给人民提供任何服务的罪恶时,谈“告别革命”,是不是对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太冷漠了?是不是对应该垮台的政权太同情了?写到这里

不由地想到,为什么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里要写上允许美国人民私有枪支,就是考虑到,当拥有军队的政府背叛人民、不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只有推翻政府才是出路的时候,美国人民可以拿起武器来革命,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民的最后权利。

革命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反映出革命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属性”。还是杰弗逊说得对:“革命犹如自然界不可缺少的雷电。”自然界浓云密布中的雷电带来了雨水,泽被了大地万物;统治者的“压城城欲摧”的黑云中爆发的革命,“用革命者和暴君的血,浇灌了宪政、民主、平等、自由的花朵”。诚如人们常说的,国家(政权)是不得不有的“恶”。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政权)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任何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语),所有的暴政都是“滥用权力”。“滥用权力”源于人的无法克服的天性欲望,欲望与权力结合必定腐败,所以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总结的“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成为人类公认的铁律。这些政治“原理”与历史的经验使人们得出这样的常识:任何政权,都有可能出现暴政或腐败成一个“罪恶的存在”。毋宁说,这个常识就是“告别革命”论者回避了的革命逻辑。难怪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被人赞为“不朽的生存智慧”,所以杰弗逊说:“革命在政治世界上是不可缺少的,革命是必要的。”

革命的逻辑是永存的,辛亥革命是不朽的。//